

## 家庭天使的“堕落”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19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

宁媛媛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外语系,合肥 230601)

**摘要:**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女性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通常都是被当时社会所故意忽视的大众女性。一方面,她们表现出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有别于家庭天使的童话;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父权制社会的种种框架,无法真正地保护自我,实现自我。盖氏借助这些形象个体为我们展现出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的生存境遇。

**关键词:**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

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一直以来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评论者们总是最关注这两部小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工人运动、阶级斗争。无疑,这的确是这两部小说所反映的“主要情节”。细读起来,小说中人物还蔓延着一些“次情节”:在《玛丽·巴顿》中“嫁接”有关于玛丽的一段爱情纠葛;《南方与北方》中玛格丽特最后与桑顿的终成眷属。但这两条爱情线在一定程度上被小说中强大的社会话语排挤到了次要边缘。若将盖斯凯尔夫人这两部小说和她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与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可以看到其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尤其显得不同寻常。在这里,笔者以盖氏的两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以下简称《玛丽》)和《南方与北方》(以下简称《南方》)及其他几个短篇故事为例来窥视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的生存境遇。

### 一

盖氏作品中的大部分女性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有工厂女工,有裁缝、洗衣工,还有家庭主妇等等。盖斯凯尔夫人曾经和丈夫威廉·盖斯凯尔来到当时的新型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定居。因此,她对曼彻斯特广大工人的生活十分了解。狄更斯也

描写过北方工业城市。有学者认为,狄更斯“是从远在伦敦的角度来看新型工业的北方。与狄更斯不同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就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她不仅很了解这里人们生活的艰辛,而且也看到了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胜利”。<sup>[1]</sup>《玛丽·巴顿》无疑是一部揭示阶级矛盾、控诉工人阶级血泪史的小说。但在小说开头对一群工厂女工的描写却洋溢着积极和自信。

一群喜洋洋、闹嚷嚷的姑娘,年龄都在十二到二十之间,连蹦带跳地走过来。她们大多数是厂里的女工,穿着她们这一类姑娘出门时经常穿的服装,那就是:一条大披肩,在中午或天气好的时候,只当披肩用,到了黄昏,或是逢到天气阴凉,可就变成了一种西班牙女人的头巾,或是一方苏格兰格子呢,罩在头上,两边下垂,有时在下颌边用别针扣住,看来倒也绰约动人。<sup>[2][3]</sup>

作者对这群年轻女工的描写笔调轻松自然而充满活力。这部小说里无论是女主角玛丽·巴顿,还是其他女性人物玛格丽特、爱丽丝,都是自食其力的女性。她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她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承担养活家庭的责任。玛丽在母亲去世后在一家裁缝店当学徒,尽管收入微薄,但在父亲失业以后,成了家里的支柱。玛丽的好友玛格丽特由于眼疾失去了工厂的工

收稿日期:2008-10-31

基金项目: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硕博科研基金项目(2006120117)

作者简介:宁媛媛,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作,靠卖唱养活自己和爷爷。爱丽丝靠洗衣为生,将一个领养的孩子抚养成人。她终其一生致力于照顾周围的病弱,为他们采药草治病。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的工作是她们的生存手段,她们也在这些看似卑微的劳动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盖氏的其他作品里也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女性形象。例如,《南方与北方》中的贝蒂,《莉比·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中的莉比和迪克森一家,《潘莫法的井》中的奈斯特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对自食其力的女性的描写也不少。与盖斯凯尔夫人同时代的夏洛特·勃朗特在《简·爱》、《维莱特》中塑造的独立女性形象,是那个时代女权运动的旗帜。然而,夏洛特笔下的女性都受过一定教育,她们绝不会将自己混同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但她们似乎又与中产阶级有一定的距离。她们是劳动的受害者,因为她们是不得已从事这些卑微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虽然她们所从事的劳动对于她们来说也是凸显坚强性格的磨砺石。她们的经历在小说中只是她们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盖氏笔下的这些劳动女性在其作品中却是一个普遍群体。劳动对这些女性来说不是不幸而是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她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们是新型工业城市里逐渐形成的新的强大力量。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也为这个区域的女性提供了谋生的手段,让长期处于压制下的女性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价值。

盖氏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有不少都是关于工业题材的小说,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金斯利的《阿尔顿·洛克》、迪斯雷利的《西比尔》等。但是,在这些男性作家的小说里,主人公往往都是男性,而那些女性角色都是被理想化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柔顺无力,或是男性追逐的目标,或是生活的受害者,与盖氏笔下的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家不同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尤为关注的是“女性如何适应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以及工作在女性生活中的位置”。<sup>[3]19</sup>在《玛丽·巴顿》与《南方与北方》中,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阶级矛盾,客观地再现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盖氏特别关心的是劳动女性,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拥有很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却没有完全被社会承认和接纳。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600万英国人中就有200万人是自食其力的;大量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寻找工作。Sarah Ellis在《英格兰的女性》里写道:女性最幸福、最有益的影响范围应该是在家庭

里。<sup>[3]4</sup>19世纪理想的女性是所谓的“angels in the house”(家庭天使)。在这个时代里,男性的工作总是受到社会首肯,女性参加到劳动大军中则常被视为社会问题,尤其会被认为是家庭的堕落。但此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的出现需要女性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将女性与职业联系在一起,因而忽视了大量而且是人数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中的女性。”<sup>[3]5</sup>盖斯凯尔夫人不仅观察到工业时代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也体察到社会结构在工业大潮的席卷下正发生巨大变化,逐步将女性从社会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广大劳动女性逐渐融入新社会结构的同时,男权统治在工业化的浪潮推动下也在发生嬗变。当广大劳动女性摆脱传统的相夫教子角色,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时候,家庭的性别角色的分工也开始变得模糊。《玛丽》里存在着两个对比鲜明的伦理体系:一个是建立在协作和分工基础上的工人阶级;一个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占有制基础上的中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赤贫状态的结果之一就是互相帮助;工人们通过克己的方式实行人道主义帮助。<sup>[2]69</sup>因此,工人阶级中的男性不可避免地要担负起抚养孩子,照顾病弱,料理家务的责任。与工人阶级相反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建立在父权制权威的基础上,是与母性传统相隔离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Chodorow 认为:“男性参与到抚育孩子的事务上来会削弱男性的侵略性,而正是这种侵略性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sup>[4]</sup>

## 二

《玛丽·巴顿》在对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母性”进行称颂的同时,对中产阶级的父权制提出了抨击与质疑。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女人结婚后,就属于她的丈夫所有。她是她丈夫的一部分财产。”<sup>[5]6</sup>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对女性的要求和压制与盖氏所赞赏的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是相悖的。有学者认为“盖斯凯尔夫人和大部分的女权主义改革家……批评丈夫们滥用他们的权力和法律而不是谴责权力和法律本身。”<sup>[6]57</sup>在这点上,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南方》中多次涉及到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小说里除了玛格丽特与桑顿

的“主情节”外,还有几个“次情节”:黑尔先生辞去教堂的职务;弗莱德瑞克的暴乱。黑尔先生之所以放弃教堂舒适的工作是因为他对教堂的权威产生了质疑。同样,玛格丽特的哥哥弗莱德瑞克是一名船员,他因无法忍受船长的专制,和水手一起发动暴乱。结果,弗莱德瑞克成了叛徒,被驱逐出英国,但玛格丽特和妈妈仍以他为骄傲,因为他是为同船水手们的利益而反抗专制船长的。小说里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情节旨在为后来的工人罢工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在《南方》中盖氏将视角集中在了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玛格丽特的身上。盖氏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劳工问题,这次是从工厂主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的角度”。<sup>[4][47]</sup>在这部小说里盖氏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引入了维多利亚时代不属于女性的政治社会领域。与《玛丽》中的劳动妇女不同的是,《南方》中玛格丽特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似乎是中产阶级女性走向社会政治领域施展才华的前奏;而在《玛丽》中,工人阶级女性则已经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但是,这些女性都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她们对身边发生的宪章运动毫不关心,没有参与到身边男人们的斗争中,玛丽对工人请愿的失败也无动于衷,直至最后,才迫不得已为保护父亲和营救情人行动起来。面对外面的世界,玛丽显得胆怯和慌张,这也寓示广大劳动妇女在其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工人阶级都挣扎在死亡线边缘,饥寒交加,劳动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养活自己和家人。因为物质的缺乏迫使她们只能局限于为生计奔波,她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玛丽》中的女性们都是这场政治风潮的旁观者。在《南方》中盖氏为中产阶级女性创造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事实上,中产阶级女性参与社会政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有一定的保障。此外,她们可以与权力有某种联系。在小说末尾处玛格丽特意外获得的财富则是她获得权力的象征。

在米尔顿这个自由的工业城市里,玛格丽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产生极大兴趣。她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城市潜伏的危机。在一次聚会中,玛格丽特与桑顿关于“男人”与“绅士”的争论不仅表明二人对待工人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表明女主人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有学者认为有关“男人”和“绅士”的争辩实际上是对女性是否拥有公众话语权的讨论。在聚会中玛格丽特与男人世界的关系是这章

的主题。而玛格丽特在工人罢工中救桑顿的举动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文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第一次代表了一位女性凭借自己的力量令人信服地将自己确立在了公众“舞台”上。<sup>[6][53]</sup>罢工中,被激怒的工人包围了桑顿的住宅,朝他扔石头。玛格丽特挺身而出,保护桑顿,被石头砸伤。盖氏违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性别观,让一个女人来保护男人。玛格丽特对男人世界不仅仅是兴趣,她也由兴趣化为了行动,直接参与到社会危机中。她在这场社会危机中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在小说结尾处玛格丽特更稳固地确立在了男性世界中。她意外获得一大笔财富,而此时桑顿正急需资金。当桑顿不得不宣布破产时,玛格丽特再次出手相助,把钱借给桑顿,让他继续把厂经营下去。当然,玛格丽特的“参股”也为她赢得了企业经营的“决策权”。玛格丽特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估测,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劳资关系。她经历了由“调和者”到“决策者”的角色转变。

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盖斯凯尔是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在 1856 年关于保护妇女的财产的请愿里签名,但她对当时的女权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盖氏明白,“丈夫照样可任意通过诱惑、哄骗、殴打他们的妻子来占有她们的财产。法律对此毫无办法。”<sup>[5][61]</sup>盖氏对维多利亚时代法律是否能保护广大妇女表示怀疑,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父权制的权威根深蒂固。除了法律制度外,妇女们还应增强她们的自主意识,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将之付诸于行动。在《南方》中,盖氏在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身上寄予了自己对同时代女性的期冀。在盖氏看来,女性单单寻求法律保护是不可靠的,她们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参与到男性的世界中施展自己的才能,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保护自我。

### 三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对女性婚姻有较多的思考。这也是盖氏笔下的女性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小说家笔下女性形象的重要区别之一。盖氏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供男人们欣赏和追求的“花瓶”,她们并不以婚姻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有的甚至终身与婚姻无缘,如《玛丽》中的爱丽丝,《莉比·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中的莉比,《潘莫法的井》中的奈斯特,还有《克兰福德镇》中的那群老妇人等。通过对这些单身女

性的刻画,盖氏进一步探讨了女性的生存价值。有资料表明,到1840年,英国男女人数比例为1000:1050。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男婴中很高的死亡率,战争和移民造成男性人数减少。在这个时代,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婚姻是唯一体面的状态和职业,而她们(中产阶级女性)中有许多人却不能结婚。到1851年,英国年龄在20和40之间的女性中,未婚的女性占了42%。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反映。例如,夏洛特的《维莱特》中的女主人公露丝·斯诺,是当时英国成千上万单身女性的代言人。与夏洛特不同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单身女性无论是生活中还是精神上都不独立于男性,她们的世界常常是没有爱情的。这些单身女性有的是中产阶级,也有的是劳动妇女。她们在生活上不仅自食其力,在感情世界里也不对男性寄予任何幻想,她们不依赖男人的情感世界生存。

盖氏笔下的这些女性们将独身视为自己既定的命运,她们无怨无悔,在各自的生活中寻找着生存的价值。《玛丽》里的爱丽丝就是这样一个独身女性。小说中对她的着墨不多,却将这位女性的生命历程完整展现在读者面前。爱丽丝终身未婚,靠洗衣服生活,她领养了一个孩子并将他抚养成人。

盖氏笔下的这些女性既无美貌也无财富,又与男性世界绝缘,她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在大多数维多利亚作品中,这些女性通常是被忽略的。在《莉比·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中莉比既不是一个妻子、母亲,也不是谁的情人。《潘莫法的井》中的奈斯特被情人抛弃后,收留了疯女玛丽,从此一生与她相伴。这些单身女性有个共同之处:无论她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选择了单身,她们都找到了人生中最圣洁的目标。

盖氏似乎在对夏洛特笔下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做出回应。她在暗示夏洛特笔下的单身女性:除了追求婚姻或者企求男人的情爱以外,还有其他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盖斯凯尔夫人在向她所处的社会表明:女人可以不是母亲,也可以不是妻子。也许是由

于盖斯凯尔夫人四个女儿中有两个终身未婚的缘故,盖氏对独身女性的境遇特别敏感。“单身女性的身份无法通过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得到认可,于是她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我”。<sup>[3]10</sup>盖氏许多信件表明盖氏并不是不赞成婚姻,只是盖氏不愿意共谋她那个时代文学中的婚姻美满神话,所以她选择打破时代规约,别具一格地展现她身边的这些女性。

盖氏作品中的主题常常备受争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盖氏笔下的女性是对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的挑战。她们无疑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盖氏认为,除了婚姻之外,女性应该有其他积极生活方式的可能。盖氏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是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盖氏敏锐地将视角投向了这群被维多利亚时代所忽略的女性身上。她们为这个时代所不容,却构成这个时代里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无论怎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天使”的童话终将只是男权社会的一厢情愿罢了。

#### 参考文献:

- [1] Gaskell, Elizabeth *North and South* [M]. UK: Wordsworth Classics, 1994: PX
- [2] 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巴顿 [M]. 荀枚, 余贵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3
- [3] Colby B. Robin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Women and Victorian in the Fiction of Elizabeth Gaskell*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 [4]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M].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5] Stoneman, Patsy. *Elizabeth Gaskell* [M]. UK: The Harvester Press, 1987.
- [6] Harman Leah, Barbara *The Feminine Political Novel in Victorian England* [M]. U. S. 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2

(责任编辑:卫 华)